

“液态现代性”视域下共同体伦理的重建

——鲍曼社会空间批判理论探赜

鲁均亦

[摘要] 在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中,鲍曼以“液态现代性”理论蜚声国际学术界。他系统阐释了从固态的、笨拙的与封闭性的现代性生产生活方式向流动的、轻灵的与不确定的后福特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为我们理解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过渡的内在逻辑提供了重要的空间哲学指引。鲍曼的批判理论蕴含着强烈的空间政治学意蕴,其社会空间批判理论的逻辑理路可以概括为对以下几个重要问题的反思:时间-空间的轻灵化转型,闲游者与流浪者所表征的阶级差异与空间区隔,资本主义公共空间的私有化与商品化,流动时代的“衣帽间式的共同体”或者“狂欢节式的共同体”等。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社会进而实现共同的善和公平正义,必须重新考察共同体的裂变,实现从“与他人共在”到“为他人而在”的共同体伦理的重建。“为他人而在”的道德责任与“自我限制”的伦理约束共同构成了鲍曼空间解放伦理的辩证特质。鲍曼的思想为我们反思当代资本主义生存空间的矛盾危机以及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 液态现代性;闲游者与流浪者;公共空间;衣帽间式的共同体;共同体伦理

[中图分类号] C9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26]02-0090-11

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作品的主题包罗万象,“从亲密关系到全球化,从电视真人秀到大屠杀,从消费主义到赛博空间”^①。在资本主义轻灵化转型的时代,鲍曼以最具原创性的“液态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②理论,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时空转型及其给人的生活世界带来的矛盾困境。既有研究成果主要着眼于鲍曼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辩论,有学者甚至认为他是“后现代主义的先知”^③,也有学者指认他创造了一种“社会学诠释学”,这种“社会学诠释学”致力于反思社会形成的条件以及社会环境的建构机制^④。但是,如果脱离了空间批判的维度,我们对于鲍曼的理论贡献的认知与评价就会大打折扣,这是因为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构成以及环境建构的“液态性”反思必然蕴含着强烈的空间关切。笔者认为,空间批判构成了鲍曼理论思考的“草蛇灰线”,鲍曼对现代性的“液态化”转型的讨论反映了时空的轻灵化发展趋势,而这种轻灵化的

作者简介:鲁均亦,男,法学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社会批判理论再研究”(项目编号:22JJD71002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及其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YJC71004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马克思主义资本循环理论视域中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5JD710019)的阶段性成果。

①[英]齐格蒙特·鲍曼、[瑞士]彼得·哈夫纳:《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话》,王立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前言”第i页。

②在此笔者将“liquid modernity”翻译为“液态现代性”而非“流动现代性”,这是因为,“液态现代性”不是简单描述“社会在流动”,而是借“液体无法保持形状、随时被倒入新容器”的隐喻,强调制度、身份、权力都已失去稳固的“塑形能力”。译为“液态”才能完整保留这一层物理-社会隐喻的对照,而“流动”只会让人想到“位置变化”,容易偏离鲍曼真正想表达的“结构失稳、持续重塑”的意图。

③[英]齐格蒙特·鲍曼、[瑞士]彼得·哈夫纳:《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话》,王立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前言”第i页。

④参见[英]齐格蒙特·鲍曼、[瑞士]彼得·哈夫纳:《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话》,王立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9页。

时空导致人际关系的陌生化重构,究其原因是资本主义消费空间的崛起使得公共空间商品化,进而带来了人类共同体的空间危机与伦理困境。鲍曼的时代价值在于通过对公共利益以及共同体的政治关切,破除利己主义的虚幻的消费共同体,重建“为他人而在”的共同体伦理,这种重建路径为我们思考“液态现代性”的生存空间危机,进而探索政治解放与伦理解放的出路提供了重要启发。^①

一、“液态现代性”:时空轻灵化的批判测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现代性问题逐步成为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话题,并且假定现代性是与时间经验的新形式有关,而所谓后现代性则标志着空间的革命。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其实两个维度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空间经验的变化总是涉及时间经验的变化,反之亦然。空间关系在现代性话语中容易被忽视,但自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福柯(Michel Foucault)、哈维(David Harvey)、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人从空间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结构性特征之后,空间日益成为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通过转变生产方式,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进而通过对劳动方式与企业技术管理方式的不断改进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甚至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私有化转型以及新自由主义的诸多措施进入了弹性生产阶段。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弹性资本主义”——来指认资本主义的新形式,此外还有涡轮资本主义、后福特主义、赌场资本主义、风险社会、“液化现代性”等理论。虽然这些新理论的研究视角存在差异,但是其关注的核心问题都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不确定”和“风险”。^②而鲍曼围绕“液态的现代性”与“轻灵资本主义”这个核心问题域,系统审视了历史上不断变化的时空的本质,以及社会组织的形式和规模之间的联系,尤其是“液态现代性”对全球的和区域的社会和社团产生的影响。

首先,鲍曼创造性地提出了“液态现代性”概念,为分析晚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提供了新范式。何谓“液态现代性”?鲍曼策略性地使用了《大英百科全书》中的权威性的释义,“流动性”(fluidity)是液体和气体的特性,“当液体和气体处于静止状态时,它们不能承受外来的剪应力或切应力的作用,因而,在受到这样的一种外力的作用时,它们在外形上会处于一种持续的变化状态”^③。液体不像固体那样能够被轻易控制并保持它们的外形。流体既没有固定的空间外形,也没有时间上的持久性。鲍曼认为:“难道现代性不是一个从起点就已开始‘液化’的进程吗?难道‘溶解液体中的固形物’不一直是它的主要消遣方式和首要成就吗?换言之,从现代性的萌芽时期起,难道它不就一直是‘流动性的’吗?”^④鲍曼更倾向于用“轻灵资本主义”概念表达资本主义新的特征,它突破了“沉重的空间限制”,突破了福柯所谓的“全景敞视监狱”的权力模型,“从沉重的资本主义过渡到轻灵的资本主义,从固态的现代性转变到液态的现代性,结果也可能是一次比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本身的来临更为激进、更具深远影响的新的起点”^⑤。“液态现代性”貌似更加开放自由的世界,但是在鲍曼看来,这种解放其实是对资本束缚的解放,曾经的秩序和牢笼被资本冲破,“单一性、稳定性、重复性和可预见性”^⑥如今被“多样性、液态性、瞬时性以及不可预见性”替代。他着重指出,全球精英挣脱了政治和文化权力单位的疆域桎梏而获得了新的自由和独立性。流动的自由迅速成为晚期现代或者流动后现代时期划分社会阶层的主要根据。鲍曼以“流动的现代性”或者“液态现代性”来分析资本主义政治经

①参见 David B. Clarke and Marcus A. Doel, “Zygmunt Bauman,” in Phil Hubbard and Rob Kitchin (eds.), *Key Thinkers on Space and Pla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4, p. 52.

②参见胡大平:《作为不可能任务的现代性》,《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3期。

③[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页。

④[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5—26页。

⑤[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4—215页。

⑥[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6页。

济秩序与空间文化表象,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其最重要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其次,从沉重的现代性到“轻灵的现代性”的转变,不仅意味着时间历史的变化,而且意味着空间结构的变化。沉重的现代性时代是领土征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财富与权力还是地理性概念,主要是指土地财产,它们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受到地理位置的约束,不可移动,不可转让。帝国的扩张主要是领土的扩张、掠夺和占有。鲍曼指出:“权力逻辑和控制逻辑,建立在‘里面’和‘外面’的严格的分离和对二者之间边界的严密守卫之上。这两大逻辑融会成为一个体现为规模的逻辑,并且都组织在这一戒律周围:更大即意味着更高的效率。在现代性的沉重性表现中,进步即意味着规模的增大和空间的扩张。”^①

鲍曼以“沉重”描述现代性的固态的、笨拙的与封闭性的生产模式与生活方式,这是福特主义生产模式的主要特征。在福特主义的工厂里,“那一在沉重现代性的时代里最为让人渴望和迫切追求的理性管理模式,是一个面对面地相见的场所,但也是一个在资方和劳方之间有着‘白头偕老、相伴终生’的婚姻誓言的地方”^②。固定的劳动时间将劳动与土地结合在一起,而工厂的巨大的建筑物、沉重的机器和持续被束缚在具体的土地上的劳动,都和资本结合在一起。无论是资本还是劳动都不能流动。随着“软件资本主义”和“轻灵现代性”的到来,曾经固定化、沉重性的生产方式与劳动模式被改变了。“液态现代性”带来的是时间-空间的轻灵化。鲍曼认为,人类力图克服空间阻力——缩短空间的距离以节省时间成本,而交通工具与通信技术的革命使得“时间”成为一个“硬件”问题,即时间不再是漂浮不定、不可掌控的东西。“时空关系变得是流程性的、不定的和动态的,而不再是预先注定的和静态的。”^③笛卡尔在现代空间征服的开始就把存在和空间性(广延性)等同起来,并把一切物质存在界定为广延性实体。罗伯·谢尔兹(Rob Shields)曾经将“我思,故我在”转换成“我占有空间,因而我存在”^④。但是在“软件资本主义”时代,软件的普及意味着时间接近“瞬时”,空间因而贬值了。在沉重现代性的资本主义时代,时间是为了空间最大化而必须加以细心管理和谨慎运用的手段。而在“软件资本主义”时代,空间的任何部分都不具有优越性,也就是没有特殊价值。资本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资本充满希望地流动着,期待着短暂的有利可图的冒险活动,并对有足够的资本和伙伴来共同进行这些冒险活动充满信心。资本能够轻松快速地流动,而且它的轻松性和流动性,已经转化成了对所有人而言的不确定性的首要源泉。这已经成了当今统治的基础和社会分工的主要因素”^⑤。

再次,鲍曼构建了认知空间、美学空间与道德空间的三重性辩证法。在《后现代伦理学》中,鲍曼划分了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物理空间指的是客观的、纯粹的、可测量的距离性空间;社会空间与之不同,是无法测量的空间,是由认知、美学与道德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构建间距的过程及其产物。“如果说认知空间是通过知识的获得和分配在智力上被建构的,美学空间是通过由好奇引导的关注和对经验强度的探索在情感上进行划分的,那么道德空间的‘建构’就是通过感觉到的/假定的责任的不平均分配来实现的。”^⑥质言之,鲍曼这里论述的问题的实质是社会空间的再生产问题。^⑦ 社会认知空间代表的是压抑和理性计算,道德空间代表的是情感与非理性冲动。将社会空间构建为一种认

①[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社会》,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7—198页。

②[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社会》,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9页。

③[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社会》,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4页。

④Rob Shields,“Spatial Stress and Resistance: Social Meaning of Spatialization,”in Georges Benko and Ulf Strohmayer(eds.), *Space and Social Theory: Interpreting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 p. 194.

⑤[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社会》,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7页。

⑥[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张成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172页。

⑦我们可以看到鲍曼与列斐伏尔对空间的划分是不同的,在后者那里,社会空间、精神空间与物质空间是辩证统一的三位一体,而在鲍曼看来主要是物理空间与作为精神空间的社会空间。鲍曼将物质空间等同于可测量的物理空间,将社会空间等同于认知、美学与道德空间这类精神空间的观点多少存在偏颇,因为其关注的主要是“我”与“他者”的主体际关系。

知空间,压抑了情感的维度或者仅仅将情感当作辅助性角色。无论是谁管理社会认知空间的活动,都必须警惕道德空间,道德空间看上去只能是不合情理的、任性的和飘忽不定的。社会认知空间在面对道德责任时是极端无效的,道德责任是构建道德空间的唯一资源。“液态现代性”虽然催生了自由流动的消费者形象与空间自由,但是也导致空间治理从社会控制的压抑模式(强行维持认知空间的秩序)转向新的诱惑模式(由审美空间的轮廓引导)。^①两者都没有给道德留下太多空间。除此以外,鲍曼研究了历史上不断变化的时空的本质与社会组织的形式和规模之间的联系,尤其是时空压缩对全球和区域的社会和社团产生的影响。他指出,全球精英挣脱了政治和文化权力单位的疆域桎梏而获得了新的自由和独立性。流动的自由迅速成为晚期现代或者流动后现代时期划分社会阶层的主要根据。争夺空间意义和权利的阐释话语权成为现代化空间之战的焦点,而其中最重要的是阐明“制图术霸权”^②的转变。技术加速发展所导致的时间-空间距离的消失并没有使人类状况获得改善和发展,而是导致了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和不平等。有些人从地方疆域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获得了自由,而另外一些人则被剥夺了土地或者领土所赋予的意义和身份认同,导致了日常生活主体际关系与生存法则的时空变化,闲游者与流浪者就体现了这种日常生活模式的双重辩证特征。

二、闲游者与流浪者的空间辩证法

在“液态现代性”时代,脱域化与再辖域化成为时空变化的基础性存在法则,社会空间与物理空间发生分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还是亲近不再固定地依赖于空间距离,陌生人成为后现代社会中的普遍性他者。尤其是在消费者社会里,闲游者(观光者)与流浪者成为同一社会人格结构的两面,同化与排斥、差异与同一成为我们必须思考和面对的重要政治问题,因为它关乎个体、身份、认同、公共利益、公共空间、共同体等重要议题。

第一,“液态现代性”孕育了日常生活的陌生关系模式。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物理性空间与社会性空间的亲近性是密切关联的。在流动性时代,“陌生人”大量涌现,这是社会空间与物理空间分离的直接结果。陌生人是生活世界中的异己存在。在物理空间中接近的人物,在社会上也许是遥远的。陌生关系曾经是偶遇和暂时接触,现在变成了一种生存的基本条件。“现代社会的问题不是怎样消除陌生人,而是怎样与它们连续地相伴生活——简而言之就是,在认识很少、犹豫不决和不确定的条件之下相伴生活。”^③现代性在与陌生人的关系中蓬勃发展,特别是在匿名资本与货币交易激增的时代条件下。鲍曼借鉴西美尔(Georg Simmel)《货币哲学》一书的核心观点,指出货币关系的普遍化带来的是陌生化的世界,所有个体都成为交换经济的原子化媒介,被消解了独特个性而变成一种抽象的“量化”存在。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这就是拜物教,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变成了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物与物的关系遮蔽甚至取代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交换经济的普遍发展使得现代生活必须以陌生人的存在为重要形式和前提。“如果现代生活要继续下去的话,就必须保护和培养陌生关系。”^④陌生人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他们挑战了公认的分类。在社会空间中,陌生人的位置和身份处于深刻的二元对立之中。陌生人力图通过消除物理空间的距离和精神空间的冷漠来消除陌生关系,但是这种陌生关系在日常生活中被反复生产出来。

^①参见 David B. Clarke and Marcus A. Doel, “Zygmunt Bauman,” in Phil Hubbard and Rob Kitchin (eds.), *Key Thinkers on Space and Pla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4, p. 51.

^②“制图术霸权”(Cartographic hegemony)是笔者融合了制图学和霸权理论构造的一个复合概念,旨在说明制图学不是价值中立、与权力无涉的纯粹描绘世界的工具,而是某些国家或群体通过垄断制图技术标准从而达到塑造世界空间、行使话语权力和巩固地缘秩序的霸权性力量。

^③[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张成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页。

^④[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张成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188页。

第二,“吞噬”与“驱逐”是陌生社会关系重构的双重策略。鲍曼以“液态现代性”的经济分析与全球化分析的方式捕捉到了现代人生活的一个新特征,即现代生活意味着与陌生人一起生活,曾经稳定的空间距离关系或者熟悉关系,在这种生活中处处体现出不稳定性、缺乏勇气以及备受考验的特征。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Claude Lévi-Strauss)在《忧郁的热带》中指出,原始社会处理陌生人的策略与文明社会不同。在原始社会里,处理陌生人采用的策略是“吞噬”:他们吃掉作为神秘力量的陌生人,可能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吸收”和“利用”他们,使他们成为自己力量的一部分。然而,由于他者总是存在于内部,现代性逐渐将其忠诚转移到一种诱人的“吞噬”策略上——旨在暂停或消灭他们的他者性。列维-斯特劳认为,现代人采取的策略是禁绝的策略,即将陌生人驱逐出生活秩序的范围,或者实施排斥、流放、监禁等。鲍曼认为,列维-斯特劳所说的这两种策略并非对立或者断裂,“吞噬”策略是“包容的”,“驱逐”策略是“排外的”,第一种策略将陌生人“同化”成邻居,第二种策略将陌生人作为异类来吞没。这两种策略合起来使得陌生人关系发生两极分化,并且明晰了两极之间的妥协空间。陌生人存在引起的困惑、矛盾的情感被鲍曼描述为“蛋白质恐惧症”,“这个术语指多样化的存在、同素异形现象所引起的忧惧”^①,这是认知空间生产的垃圾,鲍曼认为这就是与陌生人遭遇产生的最悲惨的事情或者忧惧。社会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剩下的坚固剩余物就是陌生人。“对社会空间的管理并没有消除蛋白质恐惧症;它也不打算消除蛋白质恐惧症。它利用蛋白质恐惧症作为它的主要资源,自动的或者虽然不在意但不断地补充它的库存。控制社会空间的过程就意味着转换蛋白质恐惧症的焦距,选择蛋白质恐惧症的情感对准的对象,并且将这些对象暴露在吞噬策略和抛出策略的间隔中。”^②

第三,鲍曼系统阐述了闲游者与流浪者的空间辩证法。鲍曼引述了本雅明所描述的都市空间中的闲游者或者浪荡者的形象,并指出回应陌生人必须将他们当作一个娱乐-审美的对象,这其实是一个对待闲游者的态度问题。在城市人群中,闲游者通过将身体上的接近转化为审美上的接近,通过打开另一个维度保持自己在社交上的距离。闲游者的滑稽世界逐渐转变为一个有管理的游乐场:现代性挪用了闲游者的乐趣,将其服务于消费主义。“顾客购买闲逛者的诱惑;闲逛者通过诱惑转换成了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向购物者的商品奇迹般的转化。”^③鲍曼把这样的闲逛者称为消费者,这个社会就成了区别于以前的生产者社会的消费者社会。与列斐伏尔、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伯曼(Marshall Berman)等人的立场相似,鲍曼对消费者社会进行了无情批判,但是鲍曼的着眼点在于这种社会制造出来的观光者(闲游者)与流浪者之间的对立甚至悖论性关系,及其活动在时空层面的表现。闲逛的陌生人是能够自由支配自己活动空间的人群,而流浪者则无法掌控自己生存的时间与地域,只能被迫待在原地或者被驱逐到其他地方。鲍曼敏锐地捕捉到了在“液态现代性”时代,个体生存的处境中新出现的阶层对立,对于闲游者而言能够在全球自由流动,空间对他而言已经不再是束缚,无论是真实的空间还是虚拟的空间都很容易被穿越。对于流浪者而言,只能被束缚于某地,被禁止迁移,真实空间也处于快速的封闭之中。对于闲游者而言,可以超越民族和疆界,与世界商品、资本和金融一样全球流通。对于流浪者而言,移民控制、居住法、“清洗街道”和“零容忍”政策所构筑的墙垣越来越高。

第四,闲游者与流浪者的对立与同一意味着新的阶级差异与空间区隔。在鲍曼那里,闲游者与流浪者都是消费者,而晚期现代或者后现代的消费者是感觉追寻者和经历采集者,他们与世界的关系主要是美学上的关系。这种消费主义的世界观将他们聚集在一起,使得流浪者与闲游者产生了共鸣,至少是憧憬闲游者的形象和生活方式,试图跻身于闲游者的行列。鲍曼认为,虽然闲游者和流浪者都被

①[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张成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页。

②[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张成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页。

③[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张成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205页。

塑造成消费者,但是流浪者是有缺陷的消费者——财力有限。闲游者无法离开流浪者,闲游者与流浪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流浪者是闲游者的另一个自我。区分它们的界限是含糊的”^①。也就是说,流浪者的存在使得闲游者认识到自己的闲游身份与位置,而闲游者的存在确认了流浪者的绝望。流浪者是闲游者的噩梦,是闲游者每天必须驱逐的内心邪魔。闲游者看到流浪者感觉到害怕是因为害怕自己有一天也会沦为流浪者。“没有流浪者的世界是旅游者社会的乌托邦。”^②没有流浪者,闲游者还必须创造一些出来,对于一个消费者社会而言,二者缺一不可。流浪者是闲游者的“他我”,犹如穷人是富人的“他我”,野蛮人是文明人的“他我”。流浪者模仿了闲游者的风格。

消费者社会孕育了人的两种命运和人生经历,产生了对世界弊端、对克服消费者社会内在困境方法的两种不同认识。流浪者与闲游者的缺陷掩盖了二者之间的对立以及这个对立背后的相互依赖的消费者社会存在的问题,这再次证明了全球化流动的等级体系造成的尖锐矛盾和阶级对立以及这种对立的复杂性。解除管制和私有化的消费主义世界掩盖了新自由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阶级身份和地方聚居区身份,它们受全球化的影响而变动不居。总体而言,正如鲍曼在《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中所说的,闲游者与流浪者只是现代生活的隐喻,它们指向的分别是后现代性的“英雄”与“牺牲品”。^③

三、“购物天堂”与消费空间的崛起:对公共空间的再反思

与范围广泛的陌生人相处构成了公共生活,出现了新的公民身份,这种身份是由消费能力决定的。在“液态现代性”时代,公共生活经验与公共领域被彻底改变了。

第一,消费空间的崛起导致公共空间衰落。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存在私人领域被公共领域殖民、征服和占领的可能性。鲍曼认为,重要的不是针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变动不居的边界所展开的谈判,而是“作为私人戏剧公开上演并被公开观看的场所的公共领域之重新界定”^④。陌生人的相遇是突发的、偶然的和不合适的,是一个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事件。相遇之中唯一可以依赖的是由语言、表情和肢体动作等构成的交往技巧,这就意味着都市环境必然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分享的公共空间,这与熟悉的人或者归属某个固定群体的人所营造的公共空间是不同的,后者如古希腊城邦的“广场”,这个城邦“广场”空间作为普遍的善、共同的目标和公共的生活方式展现在公民面前,被鲍曼称为“文明空间”的理想类型。在“液态现代性”社会,传统的公共空间隐退与衰落了,现代公共空间的目的主要是服务于消费,让城市居民变成消费者。

消费空间的崛起并非偶然事件,它不仅是规划过程的产物,而且是生产-消费独立过程的结果。事实上,消费空间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里为消费者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确定性。在没有充分号召力的公共领域,或者说公共领域已经成为一种象征性的、虚拟的不可能性之时,消费者只好退而求其次,即消费空间,这是一个安全的、被高度监控的和可以预测的消费世界。^⑤公共性的衰落呈现了新的意义,消费空间似乎提供了比以前更多的可能实现的制造意义的机会。个体的公共-私人经验开始受到自己消费能力的限定,受到个体把自己当作一个消费者的能力的限定。公民的本质也受到消费能力的限定,或者说公民身份本身就是通过个体作为消费者的经验来体现的。消费的私人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特征,也是当代公民身份的基础。^⑥

①[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94页。

②[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95页。

③[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性及其缺憾》,郁建立、李静韬译,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110页。

④[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7—128页。

⑤参见[英]斯蒂芬·迈尔斯:《消费空间》,孙民乐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7页。

⑥参见[英]斯蒂芬·迈尔斯:《消费空间》,孙民乐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第二,“购物天堂效应”导致“集体性存在”的缺席。鲍曼借鉴了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的“购物天堂”概念,指认购物/消费空间确实是朝圣者的天堂,但是要与节日庆典以及弥赛亚狂欢仪式区别开来。“购物天堂”犹如福柯所说的“愚人船”,“只是一个漂移的空间,一个找不到自己合适位置的地方,它孤独地存在着,自我封闭着,而且与此同时,还放任自己漫游于大海无限之中”^①。这是一个“纯净化了的”空间,用消费的同质化与丰富多彩的感官体验消除了差异性和风险,给人一种在自由和安全之间近乎完美的平衡。鲍曼指出,消费空间营造了一种“令人舒心的归属感——成为共同体一员的安慰性感觉”^②。消费使我们感觉到大家都一样的人,是没有差异的人,因而也就没有斗争或者商谈的必要,而这在以前是共同体理念最为深刻的意义所在,也是共同体具有吸引力的根本原因。“这种文化产品不仅是资本主义实现更好统治的一种有效方式,还通过经济上的巨大影响力,使得所有社会成员成为被动的消费者,最终导致大众的批判性和革命性逐渐萎缩。”^③如果说共同体是人们和睦相处、亲密无间的社会体制基础,那么在人们的真实生活中很难出现这种东西,这种共同体或者说共同体身份认同只是一种体验和经历的伪造品。在“购物天堂”里,消费者蜂拥加入虚构的、理想状态的、没有差别的共同体。陌生人在消费空间如何应对他者呢?鲍曼引述了列维-斯特劳斯的两种对他者的策略:一是“吞噬”策略,二是“禁绝”策略。“吞噬”策略是对异己成分的非异化,是对外来体的容纳、吸收和吞没,消灭不同性和差异性。“禁绝”策略是清除、禁止接触或者禁止通婚,表现在空间上就是空间隔离、区域禁止和排斥。鲍曼还认为,应该把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热(Marc Augé)提出的“非地点”(non-place)这种新的普遍性特征添加到消费空间带来的重要影响的行列中。因为在奥热看来,如果一个地点是具有归属感、关系性和历史性的,那么不具有归属感、关系性和历史性的空间则规定了一个“非地点”。这种空间类型产生于超级现代性环境中,被定义为历史加速、事件增殖与空间过剩。典型的“非地点”包括加速人与商品流动的基础设施和交通工具,如高速公路、火车站、飞机场、无个性特征的旅馆、公共交通设施、休闲公园、大型连锁酒店、大型购物中心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在这些空间中,人们只是短暂逗留,通过某种象征性的契约关系,个体表明身份而又获得隐匿性的、孤独的存在,和他者不建立情感与社会联结。^④

在奥热上述理论观点的基础上,鲍曼进一步指出,在这个消费公共空间中,个体的目的不是互动和交流而是消费。鲍曼认为,消费是一种个人的娱乐和消遣,是个体的一种主观的感觉体验。充斥在购物广场的“人群是人的聚合(gatherings)而不是人的整合(congregations);是人的群集(clusters)而不是人的集体(squads);是人的集中(aggregates)而不是人的总体(totalities)。无论他们有多么拥挤,在这些集体消费场合都没有任何‘集体性’(collective)的存在”^⑤。鲍曼引用阿尔都塞的“质询”理论,将消费者进入消费空间的过程指认为一个“受到质询”进而成为主体的过程,如果用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的说法,这个主体不过是“一种令人生疑的无差别的原子虚幻的集合”^⑥。差异逐渐被销蚀而远离人们或者被遮蔽,于是产生了一个虚幻空间。这个空间是为资本主义商品化的消遣和景观而保留的公共空间,其本质是消费者高度同化的公共景象。公共领域被贬低为商品交易的空间,公共空间本身也成了一种商品。

第三,公共空间私有化及其克服所面临的难题。公共空间私有化既是更广泛的资本主义经济社

① 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 in *Diacritics*, Vol. 1 (1986), p. 26.

②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4页。

③ 李恩来、王建又:《资本权力批判与启蒙理性批判——马克思与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两个维度》,《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论丛》2025年第1期。

④ 参见[法]马克·奥热:《非地点:超现代性人类学导论》,牟思浩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11—113页。

⑤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0—171页。

⑥ Siegfried Kracauer, *The Mass Ornament: Weimar Essays*,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79.

会变革过程的象征,也是消费者与一个世界同谋关系性质的标志,这个世界虽限制了选择的自由,但又同时声称扩展了它。^①消费空间填补了家庭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缝隙,并为当代社会的公民提供了不完整的归属感,作为一个公民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做一个消费者,因此公共空间越来越被资本化和商品化,越来越受制于私有化的准则,并且接受严密控制和高度监管。于是,公共性衰落了,作为社会成员的核心精神被消费主义冲淡了,作为集体身份认同的共同体或者公共领域瓦解了。与他者保持距离的警惕,排除交流、谈判和相互承诺的行动,是对不确定性作出的自然反应,而那些不确定性正来自流动的现代社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社群主义成为学术界激烈争论的话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对公共空间面临危机的理性回应,不过鲍曼认为社群主义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

四、从“衣帽间式的共同体”到“为他人而在”:重建共同体伦理

共同体概念最初是由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在其《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中系统化阐释的,主要指由自然意志推动形成的、以统一和团结为特征的社会结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从资本主义、印刷技术的兴起以及人类语言的多样性三重因素的叠加对共同体的起源进行了开创性考察。共同体并非虚构,而是有着确切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文化要素。鲍曼以轻灵资本主义作为重要分界,认为传统的共同体认知本身受到根本性冲击。社群主义作为回应该问题的理论思潮之一,更多的是从身份认同维度讨论当代人的分裂与团结问题。社群主义共同体是一个族群共同体,或者是根据族群的样子想象出来的共同体。这是因为:其一,族群性与人类联合体的任何其他基础都不同,它更多地把文化历史表现为“一个特定的身份事实”。其二,将民族团结作为最高原则的民族-国家是当今时代唯一拥有“成功历史”的共同体,也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唯一存在的实体。因此,作为民族团结和民族自主合理化基础的族群性就被赋予了一个历史基础。但是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成功在于对自决性共同体的压制,也就是对地方主义、地方风俗和地方方言的某种程度的限制。民族-国家的历史成就与社群主义的目标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液态现代性”时代,人们的身份变化无常,如何与他者相处,进而形成新的统一和团结是人们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与安德森的比较史和历史社会学方法不同,鲍曼更多的是从资本主义全球化经济秩序对现代人的生活空间以及身份认同的冲击这个角度来讨论问题。

首先,共同体意味着合理解决在公共空间中与“他人”共处的问题。鲍曼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不仅要说明消费者通过流动性消费扩大了个体主义的自由,同时也力图说明消费空间对公共空间的侵蚀带来的共同体的瓦解。流动性的自由同时意味着失去固定地方的安全感。“失去共同体,意味着失去安全感;得到共同体,如果真的发生的话,意味着将很快失去自由。”^②在鲍曼看来,这是“液态现代性”中深深根植于生活本质的矛盾。因此,重新编织社会共同体的纽带,促成新条件下的社会团结,促进安全和自由的平衡,是消费社会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使命。

从空间伦理的维度看,鲍曼所追求的是实现从“与他人共在”到“为他人而在”的社会共同体。“固态现代性”社会被假定为一个具有稳定的经济、完全平衡的系统和社会正义的状态,其突出特征是具有理性法律和伦理道德。而“液态现代性”社会按照股票市场或者金融资本市场的规则来解放变革的力量。“固态现代性”与对领土主权空间的迷恋存在密切关联,它从空间迷恋中获得滋养。相反,在“液态现代性”时代,迅速扩大的共同体是无拘无束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与不安全性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与陌生人相遇已经不再像在旧共同体里那样是偶然事件,而是构成这个新的扩大的共同体的必要条件。传统共同体意味着相同性,即他者是不存在的。而在流动性时代,人们摆脱了地域的限制,从固

^①参见[英]斯蒂芬·迈尔斯:《消费空间》,孙民乐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82页。

^②[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定的身份、族群、种族等身份中解脱出来,但同时又陷入了流动恐怖之中,即在获得脱域性自由的同时丧失了安全感与稳定的秩序,时刻面临着陌生人甚至入侵者的威胁。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认为,流动性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人们把由生存不确定性风险所产生的情感转向对“安全共同体”的疯狂追求。但鲍曼告诫说:“我们还是别被‘共同体安全’的迫切要求这种明显的共同特征所愚弄;它掩盖了通过社会塑造的生活条件的重大差异。即使人们暂时忘记了‘半隔离区’的精致奢华与实际隔离区的恶臭肮脏之间的差别,并想象它们各自的居民在里面同样感到安全,一个穿着‘轻巧的披风’(借用马克斯·韦伯著名的比喻)和发现自己被锁在‘铁笼子’之间的差异的世界,还将继续存在。”^①具有相同安全感的共同体是隔离区居住者的唯一选择,这种安全共同体是人们难以摆脱的“铁笼”。鲍曼认为,隔离区的实质是一个废物处理场,其功能是将那些不再作为产业后备军的穷人、无用的消耗者和有缺陷者作为废物隔离起来。隔离区表面上是给被隔离者提供一个避难所,但是隔离区的生活不可能发展出真正的共同体。“在团结一致与相互信任获得扎根机会之前,隔离区的经历就瓦解和摧毁了它们,因为这个简单的原因,在当今的隔离区中,就不会形成任何‘集体性的缓冲器’。一个隔离区不是一个有共同体感觉的温室。相反,它成了社会分裂、社会碎片化和社会沦丧的实验室。”^②由此可见,共同体的建立不仅涉及如何在公共空间中与“他人”共处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空间政治学问题,是一个空间的隔离与再生产的问题。个体在从地域中脱域的同时也需要重新嵌入某个空间之中以找到归属感。

其次,流动时代的共同体变成了短暂多变的“衣帽间式的共同体”或者说“狂欢节式的共同体”。所谓“衣帽间式的共同体”是指为了完成公开的表演或者展示,在一段时间内暂时压制个体的其他兴趣而将其聚集在一起,就像观众在进入观众席之前把外套脱下来放在剧院的衣帽间里,演出结束后“参观者又从衣帽间收拾好各自的东西,并再次穿上他们的外套和夹克,回到他们平常单调和不同的角色中,再过一会儿,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人群就消失在几个小时前人群在那儿形成的街道上”^③。鲍曼在这里所使用的隐喻与萨特所使用的“等候公交车”人群的例子某种程度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衣帽间式的共同体”的短暂存在不会使个体的关注完全集中起来成为一个“团体”,也不会由此获得一个新的属性。鲍曼有时也称“衣帽间式的共同体”为“狂欢节式的共同体”,意指它打破了平日离群索居的单调的生活场景,让人们像狂欢那样发泄被压抑的力量,以便让人忍受欢迎消失之后必须回到的日常工作。“衣帽间式的共同体”或者“狂欢节式的共同体”有效避免了真正共同体的形成和聚集,它们分散了那些未被开发的社会性的推动力量,造成了原子式的差异化个体的持久性存在,个体只能在这种情境中去寻找瞬间的满足。

最后,鲍曼认为共同体最高的伦理是“为他人而在”。批判性的社会学有责任帮助个体表达自己生活的境况,设计和构建人们聚会的场所,在这里人们就个体利益与公众利益问题展开协商。共同体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但共同体内部也存在着差异性,需要在差异性和相似性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因此,如何求同存异成为当代左翼政治思潮重点考虑的问题,尤其在面对多元主义的世界时更是如此。鲍曼认为:“最有前途的团结,是一种通过价值观、偏好以及不同生活方式和自我认同之间的不断对峙、讨论、协商与妥协而实现的团结,这种团结每天都在重新达成,其参与者是众多且各不相同、但始终自主决定自身命运的城邦成员。”^④当代社会共同体在反对原子化社会方面最应该做的事情是:“把法律意义上的个体的命运重新改为事实意义上的个体的能力,并为个体的伤残与不幸提供集体保障的必要资源。”^⑤

①[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②[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152页。

③[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25—326页。

④Zygmunt Bauman,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p. 178.

⑤[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页。

鲍曼并没有给出最终解决之道,毕竟矛盾的复杂性决定了解决这个问题并非能够毕其功于一役。在乌托邦的可能性意义上,鲍曼认为如果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共同体,那么它不仅要实现“与他人共在”,而且要依靠共同构建的共同体,特别是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人具有平等的权利以及根据该权利行动的平等的能力与责任,最终实现“为他人而在”这一共同体的最高伦理。鲍曼认为:“尽管从伦理学上来说,为他人而在(being for)优于与他人共在(being with),在自我与他人相互作用的时刻,他已经开始为他者的福祸负责任了,道德行为能够履行的唯一空间就是‘与……共在’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不断地被认知的、美学的和道德空间的交叉压力所冲击。在这个空间中,依据道德责任提示去行动的可能性必须被挽救或者恢复或者重新生产;我们必须不惜代价——有时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用技术工具算计的优越性交换它现在已经失效的、被遗忘的优先性;正如维特莱森所提出的,一种建立在正在进行的‘我们体验’基础上的优越性。如果它发生的话,它也是仅仅作为一种成就发生。对其确实会发生这种情况不存在也永远不会存在任何保证。但是每当人们关心需要关心的人、爱需要爱的人、将援助带给那些需要援助的人的时候,它确实发生了,并且每天都在发生,在不断地发生。”^①

由此可以看出,面对“液态现代性”带来的生存危机与道德伦理困境,鲍曼提出了道德自我的自主性实践方案,即在非社会强制的基础上,承担对他者的责任。在共同体伦理的视域中,对他者承担责任并非一意孤行,而是存在着“自我限制”^②的维度,这就避免了现代工具理性的强制逻辑,即将他人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这种异化逻辑。“为他人而在”的道德责任与“自我限制”的伦理约束共同构成了鲍曼空间解放伦理的辩证特质。

五、结语

纵观鲍曼一生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可以看出,他并非一名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自身定位为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相似的批判的社会阐释学学者,这种定位既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批判反思精神始终不渝的坚持,又反映了他发展马克思主义以推动理论进步的巨大勇气。鲍曼曾经在访谈中强调:“我对多年来对马克思思想的痴迷并不后悔。我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学识,或者说受到他的激励去发展我自己的认知和价值框架,我希望它们今天依然属于我。”^③鉴于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和严峻性,鲍曼鼓励人们继续保持反思和批判的勇气,并且创新社会批判理论形态,为批判轻灵资本主义提供新的工具和方法。法兰克福学派倡导并系统构建的社会批判理论在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那里其实已经走向了悲观主义,无论是诉诸实践还是拒绝实践似乎都丧失了尖锐的批判锋芒,鲍曼试图通过对“液态现代性”带来的新的空间问题的研究更新社会批判理论的问题域。

首先,鲍曼总是将时代的问题与需要作为理论反思的核心指向,指认当代资本主义具有液化化、流动化的新特征。他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反思这种新变化背后的流动资本逻辑,尤其反思当代人类社会时空的再生产机制及其带来的可能的伦理道德后果。就此而言,鲍曼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在人文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潮流中,他以“流动空间”“液态现代性”等概念与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苏贾(Edward W. Soja)、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人站在了同样的理论高度上,从社会空间批判理论角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知识谱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研究资本主义历史、空间、共同体等问题上的强大阐释力。

其次,鲍曼基于对共同体政治和公共利益的关切,批判性地分析了轻灵资本主义时代普遍流动的

①[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张成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9页。

②[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张成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8页。

③[英]丹尼斯·史密斯:《后现代性的预言家:齐格蒙特·鲍曼传》,萧韶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0页。

消费与交换对共同体的消解,认为“液态现代性”使个体走向了消费主义的虚幻性的“狂欢节式的共同体”,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型异化逻辑。鲍曼主张,我们应该致力于构建“真正的共同体”,这种“真正的共同体”构想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系统确立的。马克思在分析了人类社会依次经历的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三个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指出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交往普遍化以及消灭分工和私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鲍曼某种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旨趣,但他是从流动时空变化带来身份认同转型的视角讨论共同体问题的。种族、制度、性别、身份、权力、文化认同、全球南北秩序等问题的液化化分解与重塑是上个世纪末到目前西方政治哲学持续关注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鲍曼的解放政治学和解放伦理学的“审慎的乐观主义”不同于马尔库塞、福柯等人的悲观主义立场,不同于哈贝马斯、泰勒(Charles Taylor)等人的规范性自由主义立场,甚至完全拒斥拉克劳(Ernesto Laclau)、墨菲(Chantal Mouffe)的激进民主政治立场。鲍曼开启了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空间伦理新视野,批评了“衣帽间式的共同体”,主张构建一种不仅要“与他人共在”而且要“为他人而在”的“真正共同体”,这为重建空间伦理提供了重要方法论。

最后,他持续关注并批判西方世界知识分子的政治退却的极端功利主义与消费主义问题,指出那些人“不再关心有关善之社会的视野,以追逐个人满足的自由来取代对公共利益的忧虑,这些原应该是令我们感到羞耻的,而我们却沾沾自喜,引以为荣”^①。总之,鲍曼为当代知识分子和批判理论家应如何承担向善的生活责任,践行“为他人而在”的伦理原则提供了某种可资借鉴的范例。鲍曼的思想为我们反思当代资本主义生存空间的矛盾危机,为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启示。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Eth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quid Modernity”—A Probe into Bauman’s Critical Theory of Social Space

Lu Junyi

Abstract: In the debate surrounding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Zygmunt Bauman has gained international renown in academic circles for his theory of “liquid modernity.” He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d the transition from solid, cumbersome, and enclosed modes of modern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s to fluid, light, and uncertain post-Fordist modes, offering significant spatial-philosophical insights into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shift from modernity to postmodernity. Bauman’s critical theory carries profound spatial-political implications.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his critical theory of social space can be summarized as reflections on the following key issues: the lightness transformation of time-space; class distinctions and spatial segregation represented by the flâneur and the vagrant; the privatization and commodification of capitalist public spaces; and the “cloakroom-like community” or “carnival-like community” in the era of mobility. To build a better society and achieve common good, fairness, and justice,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the fragmentation of communities, and realize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ethics from “being-with-others” to “being-for-others.” The moral responsibility of “being-for-others” and the ethical restraint of “self-limitation”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diale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auman’s ethics of spatial emancipation. Bauman’s thought provides important insights for reflecting on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rise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living spaces and for developing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liquid modernity; flâneur and vagrant; public space; cloakroom-like community; community ethics

(责任编辑:周文升)

^①[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恐惧》,谷蕾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